

特稿

编者按:我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外语学科专业建设、外语人才培养与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推进新文科建设中外语教育与研究的守正创新,如何思考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发展带给外语学科的影响,如何参与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外语人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因此,《外国语文》从2024年1月起推出“特稿”专栏,特邀国内知名学者撰稿,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本期特邀专家为罗选民教授,罗教授为清华大学首批二级教授,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前任会长,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教授撰文《大翻译与文化记忆:融合与启示》,从跨学科的视角阐明“大翻译”的定义、功能、研究方法,指出翻译理论建构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积极意义。

大翻译与文化记忆:融合与启示

罗选民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翻译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翻译理论。本文阐明大翻译的定义与功能,对为什么要提倡大翻译以及为什么大翻译要与文化记忆相结合这两个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两个理论在跨学科上所表现出的兼容性和互补性,指明两者的融合给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带来的启示和积极的建构意义。

关键词:大翻译;文化记忆;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1-0001-08

0 引言

大翻译概念这一中国的本土理论自2015年提出后得到广泛接受,国内外中英文期刊都有相关文章发表,甚至出版了相关专著。随着大翻译研究的深入,一些基本概念需要加以规范,大翻译与文化记忆的兼容性和创新性需要得到进一步阐述。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大翻译和文化记忆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凸显该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打破传统翻译研究的文本限制,从多种媒介形式的世界经典文学改编入

收稿日期:2023-12-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翻译、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23AYY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罗选民,男,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君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比较文学和话语分析研究。

引用格式:罗选民. 大翻译与文化记忆:融合与启示[J]. 外国语文,2024(1):1-8.

手,探究大翻译与集体文化记忆生成的关系,进而分析大翻译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建构,从而制定与我国“打造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树立中国形象”等国家重要战略相吻合的国家形象建构方案,从理论和实践上为解决我国文学外译、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难题提供政策依据。

1 大翻译的定义与功能

1.1 什么是大翻译

大翻译可被定义为:它是一种翻译观念,以文化记忆为引擎,以文化传播为目的,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对翻译的文化活动进行持续的、动态的、超越性的多模态互文阐释与形象建构,提倡一种“统观”视角下的宏观性语符翻译(“忠实”不再是翻译的唯一标准)和跨学科、跨符号翻译研究。

大翻译是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国家形象建构与文化传播的“全方位”“立体化”发展理念,旨在形成翻译跨学科研究的理论纽带,建设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从新的角度审视国家文化战略实施与文化传播进程。在大翻译的思路下,翻译和翻译研究立足世界格局之上,以文化传播为终极目的,突破由语言差异、思维差异、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障碍,不仅创造优秀的翻译作品,还通过翻译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加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文明互鉴。在大翻译框架下,典籍翻译资源可实现深挖和阐发,历时与共时并重,翻译与阐述共生,文字符号与艺术行为相生,让集体文化记忆在国家形象建构上发挥重大作用(罗选民,2019:95)。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绝大多数翻译研究仍缺少一种“大翻译”视野,研究范围囿于文本层面,对跨语言、跨媒介、多模态的翻译行为与文化传播的关注远远不够。

需要指出的是,大翻译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以思想深度代表学术创新与发展。当今,国际形势动荡,文化冲突不断,西方话语仍然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对中国的误解依然存在。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这一切都预示着,在一个国际风云变幻的时代,翻译活动仅仅围绕“忠实”展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具备足够的文化自觉来应对现在所面临的翻译研究困境,除了传统的翻译分析,我们还应该从历史钩沉、理论创新、话语主导、文化传播等多方面来思考翻译问题。我们应该拓宽研究视野,开展跨学科翻译研究。翻译研究要有大格局,面向多角度,从国家的站位来思考翻译与文化传播、文化传承的关系。说到底,这些也正是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问题。

1.2 为什么要提倡大翻译?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2016年同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世界范围内开展的纪念活动告诉我们:中国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作为伟大的作家,但莎士比亚在全球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汤显祖的影响力与之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究其原因,莎士比亚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集体文化记忆,其剧本被翻译成全球各种语言,其作品形式包括剧本、电影、小说、音乐等。这足以证明一种大翻译格局的形成,其作品在不断的经典化中得到国际传播。而汤显祖的剧本还停留在本土的文化记忆和单一的舞台形式中,偶有电影作品或白先勇改编的昆曲《牡丹亭》,但总的说来是不敢越过“雷池”。如此一来,作品就难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其国际影响力之微弱也就可想而知了。

“翻译是一种批判性的、动态的置换:在识别而非模仿的过程中,翻译倾听原作,得到原本可能被隐藏的、未被阐述的东西,使得原作超越自我、跨越自身局限。”(Brodzki, 2015: 58)这种跨学科的文化翻译理论,已经成为常态,出现在文学作品的改写和演绎之中。导演通过互文手法,把《哈姆雷特》中人的故事转嫁到动物身上,于是有了电影《狮子王》;中国导演冯小刚移花接木,把丹麦的宫廷政变巧妙地挪到中国,变成中国的宫廷政变和复仇故事。类似的还有日本知名导演黑泽明曾于1957年执导的电影《蜘蛛巢城》,该电影乃根据莎士比亚的名作《麦克白》改编。剧中人物、情节、音乐等无不日本化,日本歌舞伎表演同西方现实主义风格结合起来,将莎士比亚戏剧惟妙惟肖地搬上日本的银幕与舞台。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复述与演绎中,造就了经典的、世界性的、永恒的莎士比亚。

罗曼·雅各布森(Jakobson, 1959: 233)提出了三类翻译:“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它们与大翻译有什么关系?大翻译的内涵更加宽泛,包含了雅各布森三类翻译的概念。雅各布森提出三类翻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其概念是孤立、无意图性的,缺少语境与施事者。而大翻译指的是一种翻译观念,以文化记忆为引擎,以传播为目的,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对一种文化的经典翻译进行持续的、动态的、超越性的多模态互文阐释与形象建构,它是一种“统观”视角下的宏观性语符翻译实践和跨学科、跨符号翻译研究。所以,大翻译具有社会性、互动性、系统性和意图性。大翻译中的一些因素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不被认可,它们也不在雅各布森三类翻译的范围之列,如“莎士比亚的星球大战系列”。

伊恩·德舍尔(Ian Doescher)的《威廉·莎士比亚的星球大战》,其实是借用了莎士比亚的五幕剧和无韵诗形式,将美国著名编剧、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现代经典《星球大战》进行改写和翻新,使其产生新的魅力。“莎士比亚的星球大战系列”一共有九部,大致遵循的都是这个套路。这种通过运用体裁互文性的手法而产生的大翻译,借尸还魂,移花接木,不仅让作品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也让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和无韵诗形式借此得以彰显。它映射了我们所说的多模态的大翻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它不是一个交响乐队中的最重要的乐器,如钢琴、小提琴或者是黑管,却类似一个架子鼓,虽处边缘,却为交响乐演奏起到了艺术烘托作用。大翻译就类似交响乐,要以排山倒海、气势恢宏的乐章去表现一个民族的宏伟叙事,发出时代的强音。

2 文化记忆的几点感悟

通俗地讲,文化记忆是指人们通过学习和体验,从先辈、家族、社区等不同渠道获取的某一特定文化群体的本体经验和历史记忆,并将其加工和传承下去的过程。文化记忆理论则是指研究和解释人们如何从文化遗产中获取信息、理解历史、认同文化、维护文化传承的一套相关概念和观念。

1235年出版的《最新修辞学》曾经这样来描述记忆的定义:“什么是记忆?记忆是一种让人荣耀的、令人艳羡的自然恩赐,通过这种方式,得益于回忆的逼真,我们可以追忆过去、拥抱现在、畅想未来。”(勒高夫,2010:87)这个定义比较朴素、自然,涉及的是个体,其学科属性不强,记忆维度有限,属于早期简单的定义。当今,有关记忆的种类很多,研究的维度不一样,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术语,如个体记忆、公共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

“文学家、埃及学家、史学家、传媒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研究回忆和记忆现象……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de Wir-Gruppe)的过去的感知与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韦尔策,2007:3)韦尔策(Harald Welzer)的话说明了记忆研究的跨学科性,指出了记忆研究的文化使命,即立足于现在来感知和诠释自我和社会群体,从而寻找一种同一性,在同一的基础上去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在这一点上,无论在中国抑或西方,其目标都是一致的。

按照文化学者的思路,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是最佳的叙事视角和研究路径。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我在本文中更加愿意从纷繁的术语中列出两对记忆术语来加以讨论,为我所用,尽管这样做会招来文化研究学者的批评。这两对记忆术语分别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它们对我要阐述的大翻译和国家形象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

2.1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法国学者哈布瓦赫最早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他打破过去研究中把记忆看作是个体或族群现象的传统,指出了记忆是社会性的。记忆的社会性“有两层含义:首先,他产生于集体又缔造了集体。其次,个人记忆属于群体记忆;人们不是单纯地活着,人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回忆的;个人记忆正是各种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埃尔等,2012:23)。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影响深远。他阐明了记忆的基本特征,强调了文化语境与社会和个人的关联性,贡献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和群体概念。集体记忆研究冲破了围绕个人、族群等而展开记忆研究的禁锢,也为后来的文化记忆研究铺平了道路。哈布瓦赫(2012:68)后来认为:“我们或许有理由区分两类不同的记忆,一类可以称为内心或内部记忆,另一类是外部记忆,或者也可以把这两者叫作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更确切地说,可以把它们称作自传记

忆与历史记忆。”

个人记忆必然带有社会属性和群体关联性。因此,我们认为将个人记忆归属于集体记忆之中并将其排除在专门讨论之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自传记忆需要借助历史记忆,毕竟我们生命的历史最终属于公共的历史”(哈布瓦赫,2012:68)。既然“个人记忆正是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那这个交叉点一定有它的个性和内涵。于是,这些具有差异性的个体记忆组成了色彩斑斓的群体记忆或集体记忆。此处,我更愿意用个体记忆来替代个人记忆。个体记忆是个相对的概念,个人与群体、群体与族群、族群与国家、国家与世界相对来说都呈现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我们以这种记忆的封闭与开放、短暂与持续、静止与传播作为鉴别基准。个体记忆可以是地方性的,而集体记忆是世界性的。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汉语文化圈形成了集体文化记忆,但对于整个世界文学来说,它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并不为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熟知,仍然停留在世界文化圈的个体(局部)文化记忆之上。对于它的评价,我们取其参照物来决定。局部对整体,就是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文化记忆理论只能用于文学作品的个人心理和角色的重构,无法从世界大格局方面来说清楚文化传播和世界文学经典如何形成这个复杂的问题。

2.2 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记忆》一书中,对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做了详细的区分。前者是以诸多个人生平为框架的历史经验,通过日常生活互动产生,形式模糊,以个体记忆为媒介,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当下的80到100年,大概包括三四代人,并且旧的交往记忆不断为新的交往记忆所替代;后者是具有神话色彩的历史起源,属于绝对过去的事件,它被创造出来,具有高度的形式性,表现为仪式性传播的节日庆典,拥有固定的物化媒介,即以神话、图像、舞蹈等进行的传统性象征性编码/排演。它有特定的传统载体,涉及的时间是绝对过去,指的是具有神话色彩的原初时代(王建,2012:13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交往记忆具有短暂、模糊和不确定性,缺少仪式感、庆典和象征性的编码,往往涉及当下,具有形而下的特点。相反,文化记忆具有稳定性、清晰性、持续性,具有历史的维度、仪式、庆典、特定的编码,它指向过去却影响现在,具有超然和形而上的特点。交往记忆对应个体记忆,而文化记忆则对应集体记忆。于是,它们组成了一对相辅相成的复合体,为给我们做翻译和大翻译研究提供理论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与集体记忆相比,文化记忆理论更加强调记忆的文化功能。文化把记忆和群体结合起来,形成了文化语义的三角体。在群体里,不存在彻底的个人记忆。个人记忆只是集体记忆网络上的一个节点而已,个人的所有活动都是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的。个体记忆是对整个集体记忆的眺望,当集体语境发生变化时,个体记忆的关注点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是因观察的角度不同使然,颇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色彩。

如今,文化记忆理论在中国已经得到高度的关注,相关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也涌现出

一批文化记忆的研究学者。他们活跃在文学、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学术译著和著作也不断地问世。遗憾的是,把文化记忆引入翻译研究中的成果仍不多见,把翻译与文化传播相关联的思考依然阙如。这一切都有待改进和提高。

3 大翻译与集体文化记忆的融合

大翻译与集体文化记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简单地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从前面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归纳出集体文化记忆的几个属性:(1)集体文化记忆是时间性的,具有重构性;(2)集体文化记忆是社会性的,具有互动性;(3)集体文化记忆是空间性的,具有视觉性;(4)集体文化记忆是回溯的,具有意图性;(5)集体文化记忆是有关历史的,具有认同性。上述这些属性与大翻译都息息相关。下面我们逐一对它们的关联点进行分析。

3.1 集体文化记忆是时间性的,具有重构性

这一点与翻译不谋而合。文本翻译与解读都需要集体文化记忆来激活,来重构。如果翻译活动缺少了历史、图示、感官和经验的注入,这样的翻译一定会是空洞和苍白无力的。比如在翻译李白《长干行》的诗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住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时,如果不对文本做历史的考证和实况还原,以为仅凭字面意义就可以完成翻译,这种想法是十分天真和滑稽的。该诗成文于盛唐时期,“青梅”“竹马”的所指与能指是一个什么关系?唐朝的“床”与现代的“床”是否相同?如果不从集体文化记忆去激活这些文字和意象,即便是经验老到的翻译家也难免遭遇翻译的滑铁卢。要重构翻译文本,我们要从时间的维度去挖掘原文的文化古迹,重构文本的意义和意象。

3.2 集体文化记忆是有关社会的,具有互动性

翻译亦是如此。为了达到与读者最大的互动,我们需要文化记忆的指导,通过翻译分析来还原文本的真实,译本要让读者易于接受和欣赏。这种互动就需要译者具备更高的叙事能力,创造忠实而优美的译文。一如严复(1998:27)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言辞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为此,在叙事策略方面,严复采用了桐城派的风格,因为“这一学派的创立者们自认为代表了一种新的文风,既反对清朝考据派无文采、无章法的文体,又反对六朝华而不实、浮艳巧辨的骈体文。他们在寻找一种既能表达严肃的哲学内容,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令人满意的文体。于是,他们与唐宋‘古文’运动一样,也回到先秦哲学家那里寻找文体典范,人们在那里发现了精确与华丽、简洁与深奥、明晰与雅致的巧妙结合”(史华慈,2016:89)。我想严复应该达到了他的目的,其书在商务印书馆印出,与读者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喝彩声不绝于耳。

3.3 集体文化记忆是空间性的,具有视觉性

翻译认知具有三种要素:思维、经验、感官。能在翻译中得心应手地运用三种认知能力

者少之又少,要在翻译实践中运用感官认知则更是难上加难了。在翻译中,感官是否运用得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翻译的成败。设想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时,读到古希腊的神庙、恺撒凯旋的阵仗、埃及女王的高贵与冷艳时,我们应该阅读图片,了解古希腊的城邦与建筑,甚至要去看影视剧,去感受声音,聆听音乐……无数碎片化的古物在视听体验中复原,推动翻译的合成,从而产生具有视觉图像性的翻译。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有一段对埃及女王在画舫里的描写,笔者在译文中融入了空间感和视觉性:

她乘坐的那艘画舫就像一尊发光的宝座,/映在水面上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艄楼是用黄金铸造的,船帆是紫色的,/熏染的香氛,逗引得风儿也害起了相思;/船桨是银色的,和着笛声的节奏/在水面拍打,似乎感染了痴心的水波,/加快速度,紧追不舍。至于她本人,/美得简直无法形容:她斜卧在/用金线织成的锦绸幔帐之内,比画家笔下/栩栩如生的维纳斯女神还要娇艳……(莎士比亚,2016:52)

3.4 集体文化记忆追溯以往,具有意图性

翻译行为与译者意图须臾不可离。意图性往往指导翻译行为,如清末民初的著名翻译家林纾、严复、马君武等的翻译活动,其翻译的意图性非常明显,即引进西方文化,寻求中国富强。严复的翻译取材也体现了这个意图,他的八大译著无不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所以,他被称作“引进西方思想的第一人”。严复从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发达中感受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从人的教育开始,呼唤人之觉悟、文明之邦之治理。“严复在西方思想中发现的秘密至少有两个方面,并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充分展现人的全部活力;另一方面,则是将活力导向服务于集体目标的热心公益精神。”(史华慈,2016:VII)这就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家严复的意图,他把这些意图完整地贯彻在他的翻译活动中。他和同时代的林纾在翻译中常会夹杂个人的评述,这就是一种文化记忆的行为,以此加深译者意图,更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3.5 集体文化记忆是历史的,具有认同性

集体文化记忆是历史的,翻译活动也是历史的,也追求认同性。文化记忆理论研究和解释人们如何从文化遗产中获取信息、理解历史、认同文化、维护文化传承。我们今天的翻译也是如此,我们要通过翻译来讲述中国的故事,通过翻译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于是,逆翻译,即中国学者和翻译家把中文作品翻译成外文便应运而生,对世界发出中国译者自己的声音。黄友义(2022:294-295)先生在《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外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认为通俗易懂的概念,外国人未必能够理解和认同。例如,我们说‘和为贵’,构建‘和谐世界’,而西方很多人的理念是‘零和游戏’,认为你发展了,就是威胁和侵占了他的利益。”这是一部对外传播与翻译实践文集,意在唤起我们对翻译的认同,通过翻译来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他的这部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和翻译事业发展进步的见证和呈现。

4 结语

大翻译是中国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与世界文学翻译经典的形成密不可分,是世界文学得以建立的基础。从《哈姆雷特》的发生与传播分析可知,集体文化记忆的发生与运动催生了世界文学的翻译经典或翻译的世界文学经典。过去中国的翻译活动基本上停留在个体记忆之上,在异文化传播方面没有形成一个“产业链”,故无法在传播的速度、强度和接受度方面取得好的效果。此外,我们在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影响力不够,在国际舞台的展现不够。要想让中国文学作品得到世界性的广泛传播,要想让中国在世界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就必须注重大翻译,建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集体文化记忆。唯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Doescher, I. 2013. *William Shakespeare's Star Wars*[M]. Philadelphia: Quirk Books.
- 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G]//B. Reuben. *On Trans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2012.文化记忆理论读本[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Brodzki, B. 2015. 《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翻译、存活和文化记忆》序言[J].蒋林珊,译.亚跨学科翻译研究(1): 57-70.
- 哈拉尔德·韦尔策.2007.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G].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赫胥黎.1998.天演论[M].严复,译.冯君豪,注解.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黄友义.2022.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M].北京:外文出版社.
- 罗选民.2019.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中国外语(5): 95-102.
- 莫里斯·哈布瓦赫.2012.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G]//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丁佳宁,译.曾祺明,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莎士比亚.2016.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M].罗选民,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史华慈.2016.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叶凤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王建.2012.从文化记忆理论谈起——试析文论的传播与移植[J].学习与探索(11):130-134.
- 雅克·勒高夫.2010.历史与记忆[M].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扬·阿斯曼.2015.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Big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Integ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LUO Xuanmin

Abstract: Big Translation, pro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is a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Big Translation, mak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two issues of why we need Big Translation and why Big Transl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cultural memory, points out that the nature of the two theories is compatible and complementary interdisciplinarity, as well as the enlightenment and significance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bring to the Chinese culture transmission.

Key words: Big Translation; cultural memory; interdisciplinarity

责任编辑:龙丹